

歌德与中国

杨武能

Aus dem fernen Osten,
wo die Sonne aufgeht,
sende ich dir viele viele
Grüße und Glückwünsche!

从遥远的东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送你许许多多
祝福和问候！

Aus dem fernen Osten,
wo die Sonne aufgeht,
sende ich dir viele viele
Grüße und Glückwünsche!

从遥远的东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送你许许多多
祝福和问候！

Aus dem fernen Osten,
wo die Sonne aufgeht,
sende ich dir viele viele
Grüße und Glückwünsche!

从遥远的东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送你许许多多
祝福和问候！



读 * 书 * 文 * 丛

歌 德 与 中 国

杨 武 能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宁成春

歌 德 与 中 国

GEDE YU ZHONGGUO

杨武能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15,000字

印数0,000—3,000

定价4.30元

ISBN 7-108-00379-1/I·91

序

最近几年，杨武能同志专门从事于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卓有成绩。现在又写成了一部《歌德与中国》，真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我个人觉得，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禁脸上发烧，心里发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统治者，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最重

视的所谓“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鲁迅先生发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的慨叹，良有以也。

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端在启蒙。应该让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大势，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看待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眼光。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总是像解放前一百年来那个样子的。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从十七、八世纪欧洲一些伟大的哲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点。杨武能同志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这种情况。

这充分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辩证观点。盲

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菲薄，也决不是正当的。我们今天讲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应该有鉴别的能力，应该能够分清玉石与土块、鲜花与莠草，不能一时冲动，大喊什么“全盘西化”，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西方有好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难道西方所有的东西，包括可口可乐、牛仔裤之类，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吗？过去流行一时的喇叭裤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应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在若干年以后，回头再看今天觉得滑稽可笑。我在这里大胆地说出一个预言：到了2050年我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回顾今天，一定会觉得今天有一些措施不够慎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采取的。我自己当然活不到2050年，但愿我的预言不会实现。

这一本书对德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读者怎样呢？我认为也同样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有一些德国人——不是全体——看待旧中国，难免有意无意地戴上殖民主义的眼镜。总觉得中国落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象是中国一向如此，而且

将来也永远如此。现在看一看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怎样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会促使他们反思，从而学会了用历史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一切。这样就能大大地增强中德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基于上面的看法，我说，杨武能同志这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为序。

季 羨 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南京

引 言

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者走到了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中德或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有中德两国的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

一百多年前，德国已有人开始研究歌德对中国的了解认识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后来，其它一些国家学者也就此题目发表了难以尽数的论文和专著。拿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博（Günther Debon）的话来说，“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几乎都研究过了，要讲的话几乎都讲完了。”因此，笔者只准备将前人重要的成果加以归纳总结，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并在必要时做一点分析和评论，这样便产生了本书的上篇。

反之，对于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有关歌德及其作品、思想在我国的介绍、研究和影响问题，却迄今未见有深入、系统的考察和论述。不独国内如此，国外亦然。也就难怪，在一九八二年纪念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前后，笔者发表几篇不成熟的文字，竟在国内外引起注意，应邀参加了在海德堡举行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随后，我又获得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联邦德国深入进行同一课题的研究。

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研究的大题目。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着重的是比较文学的所谓影响研究，因此使用的主要是实证的方法，对文学和文学家谈得也比较多。有关的材料和事实是异常丰富的，只不过过去被淡忘和忽视了；现在发掘、整理出来，不仅可能使人感到新鲜，感到惊讶，还可能引起我们思考，给我们启迪。试问，有谁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竟有不止一位十分重视歌德？在我们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中，竟有那么多受过歌德影响，与歌德发生过关系？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小说，竟受到一代又一

代读者喜爱，有不只一种中文仿作？歌德作品中的人物竟然改头换面，参加我们抗日宣传的行列？……材料的丰富和富有启发性使笔者禁不住产生一个希望，那就是这本浅薄的小书或许能得到学术界同仁的理解——这当然包括批评和指正——，能为较多的读者所接受，从而引起大家对于类似的研究的兴趣，使不久的将来便有更深刻的著作问世。

在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中，我得到了前辈学者钱钟书、冯至以及联邦德国德博教授、鲍吾刚教授（Wolfgang Bauer）的指点，同辈学友杨义、张隆溪、赵毅衡等的帮助，特在此衷心感谢。

杨武能

一九八七年三月 于重庆四川外语学院

目 次

1	序
1	引言
1	歌德与中国
3	一、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 “中国热” ——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 历史文化背景
25	二、歌德——“魏玛的孔夫子”
57	三、歌德和他的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72	四、歌德论“世界文学”

87	中国与歌德
89	一、歌德在中国
	——一百年来的 介绍、研究和接 受史的回顾
136	二、歌德与中国现 代文学
155	三、郭沫若与歌德
188	四、为大师造像
	——中国诗人笔 下的歌德
208	五、今日中国：“歌 德已经死了”？
	——歌德 当代 中国青年
226	六、“去受苦，去哭 泣，去享受， 去欢乐！”
	——记当代中国 的歌德译介者

歌德与中国

一、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 前后的“中国热”

——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
历史文化背景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由于葡萄牙商人打开了从印度前来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多了^①。接着，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涌来中国，据统计，到一七八〇年为止，仅耶稣会一个教派派遣的神父和一般传教士就达四百五十六名之多^②。他们大都学识渊博。为了取得明清朝廷和士大夫阶级的信赖，他们在宣传耶稣基督的

① 在此之前，从中东经河西走廊或蒙古来中国的陆路充满了艰险，使想来中国的西方人大多要么望而生畏，要么半途而废。

② 参见L.Koch:《Jesuiten-Lexikon》，Paderborn 1934, S.326.

教义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向人们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象意大利人利玛窦、闵明我，法国人金尼阁、杜哈德和德国人汤若望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他们影响下，我国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一批学习和引进西学的著名学者。

然而，中西文化交流这第一次高潮的主要流向，却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传教士们的大量报道、著述和通信，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细地介绍到了西方，使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前后历经劫难的人们惊羨不已，由此造成了持续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在德国，这“中国热”于歌德出生前后的启蒙运动和罗珂珂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

“中国热”最明显和充分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地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时髦，即所谓 *Chinoiserie*（汉风）。当时源源传入欧洲的除去早已闻名的丝绸和茶以外，还有瓷器、漆、漆器、糊壁纸、皮影戏乃至轿子等等。人们不但从中国大量进口这些东西，还竭力自行仿制，例如一七

○九年在德国迈森,波特格尔(Böttger)终于烧制成了第一窑中国式的瓷器;自那以后,迈森这个地方一直以出产精美瓷器闻名全欧。人们不但引进这些东西本身,还引进使用它们的排场和方式,例如一七二七年,维也纳王宫中就下了一道懿旨,规定只有皇上的御轿才允许是黄色的,其他官员、贵族的轿子一律为黑色等等,以通过颜色和造型来区分坐轿人的品级。在德国,也曾时兴过坐轿子,据记载,科伦大主教克勒门斯·奥古斯特(Clemens August)就喜欢象个中国大老爷似的让人抬着去巡视自己的教区;而迟至一八六一年,纽伦堡的市政府还郑重其事地颁布了一套乘坐轿子的新规定。^①

与此同时,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也在十七世纪传入欧洲,先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一六七〇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依宫(Trianon);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园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很快也在德国流行开

^① 详见: A.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Berlin 1923, S. 41.